中西文化交流及其他

——张隆溪先生访谈录*

杨昊成[1]　张隆溪[2]

(1. 南京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2. 香港城市大学　比较文学与翻译系，香港)

摘要: 本文是 2014 年 4 月下旬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镜中之镜: 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期间，作者对著名学者张隆溪先生的一次访谈，内容涉及中国文化与文学“走出去”、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文学翻译、海外汉学等问题。张先生以其一贯的博学，平实、逻辑、理性地谈了自己对以上诸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 中国文化“走出去”; 比较文学; 世界文学; 文学翻译

Abstract: This is an interview with Zhang Longxi, a renowned scholar and comparatist, during “Mirror in Mirror: Symposium on Transl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late April 2014. It covers such issues as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going glob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overseas sinology. With his usual erudition, Zhang expresses his views on the aforementioned issues in a manner of plainness, logic and good reason.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literary translation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6101(2015) 01 - 0188 - 14

DOI:10.16234/j.cnki.cn31-1694/i.2015.01.015

杨昊成: 张先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口号喊了有些年头了。从表面看，自有其合理性，因为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作为“地球村”重要一员的中国，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依然不为外部世界所了解，是一件很滑稽、也很“不公平”的事情。但事实是，中国文化对于外部世界来说确实还是相当陌生的、虚玄的，至少我们可以说，中国人对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了解，大概总要胜过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可是这其中有一个选择与接受的问题。这自然让人想起五四文化先驱以及在他们的启蒙、鼓吹下，全民族燃起的对西方文化的普遍渴望与热情，所以那时是积极主动的“拿来主义”，不乏盲目的全盘西化，甚至像鲁

* 本访谈录已经张隆溪先生本人审定。

迅这样的人,一度也曾激进到劝年轻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的地步。时至今日,虽然国人已变得更加理性成熟,但对西方文化的热情并未稍减。与我们相比,西方主要强国似乎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文化“走出去”的问题,而一般的非强势国家又没有那么强烈的自我推销的愿望。反观我们自身,眼下这“走出去”的宏大话语背后,是否有可能隐藏着什么更为深刻或微妙的动机呢?

张隆溪:当然有。我想一个方面是,任何一个国家强盛之后,尤其是经济发展之后,总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向外去推展,这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从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也是这样,比如法国有 Alliance française,英国有 British Council,德国有 Goethe-Institut,韩国有 Korea Foundation,日本有 Japan Foundation,等等,他们都希望通过各种办法把自己的文化推广出去,或者希望别国的人了解他们。尤其像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都特别希望西方人了解他们,这是很正常的。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也想尽可能地让人家了解自己的文化,这也很自然。不过还有一点,中国希望借此改变自己过去的形象,因为从上世纪 50 年代到文革,中国在西方基本不是一个正面的形象。具体的做法就包括如今世界各地所开办的孔子学院。不过孔子学院虽然建立了不少,在国外提供中文课程,但是在很多地方与当地大学的关系却不是那么融洽。记得 2009 年我当选为瑞典皇家学院院士后,他们曾邀请我去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一些国家,比如丹麦、挪威、芬兰、瑞典等国做了一次巡回演讲,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文章,在《上海书评》上连载了 2 – 3 期,其中有一段就讲到这个问题,因为我在那儿看到了孔子学院的一些情况。孔子学院的设立和法兰西文化协会或歌德学院一样,没有什么不好,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够使别人接受?为什么中国人在外面的形象有问题?这些是值得我们考虑的。“走出去”这个口号背后当然有这些因素在起作用。如果说别人对中国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或者喜欢上了中国文化,那么他们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但就像你刚才讲到的那样,如今的情形跟五四时候大不一样。Venuti 他们就讲过,什么时候翻译会变得很重要?当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认为自己特别需要从外面去吸收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的时候,就会特别注重翻译,五四就属于这样的情形。但还有另一种情形,比如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佛经翻译始于东汉,一直持续到唐代,出了一些很有名的翻译家,像鸠摩罗什、玄奘等。但佛经翻译并不是因为中国觉得自己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出现了危机,需要从佛教那里去吸收新的思想。所以 Venuti 等人的话有道理,但不是绝对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完全是当一种文化

出现危机,需要从外面去吸收新思想的时候才会有翻译。中国的佛经翻译就是一种平常的文化交流的方式。我本人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国和西方,或者说东方和西方之间沟通的必要和可能。

杨昊成: 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件事大致有两个层面的人在做: 一是各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文化官员,其次是包括研究者、作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人员、出版人等在内的专业人员。但就具体做法来看,这两个层面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各自的视角不一样。官方更关注的是推出去的内容,愿意别人看到我们优秀的文化。但这些官员许多是不通外语的,有的对西方的阅读心理和阅读习惯也不很了解,他们似乎在一厢情愿地强力推出一些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专业人员则不同,他们在选择译介内容上的标准和前者不尽相同。我想请张先生就这个问题,结合您在这方面的经验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隆溪: 从大的方面讲,我觉得这两个层面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冲突。比如两者都认为,四书五经等中国古代经典应该翻译出去。当然,许多经典西方的一些汉学家早就有过很好的翻译,是否需要重新来做,或者还是重印,这是可以商榷的。但这些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可如果涉及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现当代作品的译介,就可能存在问题。总的说来,用“推”的办法“走出去”,效果是不好的。根据我在国外的经验,我知道许多东西还是遭排斥的。比如许多大学里的孔子学院,做的事情其实是很肤浅的,教人家认几个汉字,打打太极拳,学学剪纸等,这不是传播真正中国文化的精髓,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是他们对中国政府不信任。他们知道钱是汉办出的,是政府行为,甚至会觉得这是一种文化侵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比如孔子学院派出去的教师能给人家讲一些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那么慢慢地,人家也许就会接受。所以理想的状况不是我们去强推,而是让西方人发生兴趣而主动来选择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进行翻译、介绍,这样的效果要好得多。

杨昊成: 就像今天会上[①]有几个翻译家讲的那样,我看到这个东西就爱上了它,就有一种翻译的冲动。

张隆溪: 对啊! 这方面以前的汉学家和现在的汉学家都做了不少工作。

---

① 2014 年 4 月 21 – 22 日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镜中之镜: 中国当代文学及其译介研讨会”。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现在所做的部分工作就是政府想做而没有做好的工作。比如欧洲的 Brill 出版社，它的总部在荷兰莱顿，是一个有着 300 多年历史的老牌出版社。他们出的书很贵，每本都是 100 多美金，但他们压根儿就没想卖给个人，都是卖给图书馆，书出来后，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图书馆都会有，所以他们也不会亏本。我现在给他们编两套书，第一套叫做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他们请我做主编，是我和德国的一位教授在做。今天会上不是还有人在讲嘛，中国文学有人在译介，但文学批评、理论没有人做。但我现在做的恰好就是这个工作。我可以把那个网站发给你。我们现在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了，第一本是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后面还有陈平原、陈来等学者的书，最新的一本是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另外一套叫做 *East Asi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eries*，也是由我主编，跟我合作的是波士顿大学的一位女学者，也是个德国人。这第二套丛书中的第一本就是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因为这一套是讲比较文学与文化的，所以钱先生的书当然是最合适的。正好也有人翻译了这本书，他让我帮他看稿子，所以就出了这第一本。因此，这些东西由国外人来翻译，由欧洲出版社出版，它们在外面的影响就比较大。其实翻译等费用大多也都是中国政府出的钱，但没有任何人说这是中国政府的行为。具体做法是，先由国内有关出版社把要译介的书推荐给 Brill，出版社再给我，我看后觉得可以，就让出版社去找翻译，翻译的样稿再给我看，我觉得不错就可以出，翻译质量不行就坚决不用。应该说，基本上还是能够保证质量的。

杨昊成: 这就引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由您这样有眼力而且博学的人来把关，内容上是不会有问题的。在中国的语境下，只要不踩红线，人文社科类成果，只要是真正能够体现中华文化精华的，译介出去我想政府也不会反对。那么就有另一个问题，语言的问题。这就让我想到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比如存在了 50 年的 *Chinese Literature*，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合译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北大一位老先生翻译的唐诗宋词等，至少从我目前听到和看到的情况来看，它们在西方所得到的反映基本都是负面的。2006 - 2007 年我在哈佛做博士后，那时我英译的一部中国古典诗词集《历代名人咏江苏》刚由广陵书社线装彩印，我带了一部到哈佛，请 Stephen Owen(宇文所安) 先生指教。我在拜访他的时候顺便提到了那位老先生英译的诗词，问他是否看过。他说“Of course”。我就问他觉得怎么样，他连说了两遍“Rotten stuff! Rotten stuff! ”让我大为震惊。但它们在国内有着众多的“粉丝”，有大

量的硕士、博士论文都在“赏析”这些翻译，许多作者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些译作在西方的可接受性。所以我在想，中国文化“走出去”，从翻译的角度看，是否应该从以前许多人认为是理想的那个中国译者为主外国译者为辅的模式，调整为外国译者或汉学家为主、中国译者为辅的模式。您怎么看?

张隆溪：前些年我在香港办了一个内部刊物，很薄，插图很漂亮，叫 *Ex/Change*。这份刊物不是纯学术性的，但非常受欢迎。撰稿人基本都是我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朋友，都是很好的学者，没有稿费，一年 3 期，办了十多期，现在停了。刊登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者用英文撰写的有关东西方文化方面的文章，也有一些是有人用中文写好后我们找人翻译的。现在国内学英文的人不少，有的学得也不错，但能够写得好，尤其是对英文有一种感觉，了解这类文章或书在国外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的人还是很少。像你刚才提到的那位老先生所译的诗歌，为什么被人称为“Rotten stuff”? 我想主要是因为他用了自己认为可行的 19 世纪那种比较老式的押韵的模式。我并不反对押韵，许多 free verse 也是有问题的。但他译的诗又不是真正维多利亚时代像 Tennyson 那样的诗人的诗。用一种现代人不太喜欢看到的老旧的形式来翻译，自己对语言的把握又不是太好的话，效果自然不会理想。有些人就是很固执，他们真的不了解外面的情况。比如刚才提到的葛兆光那本书，他们请了一位懂英文的人翻译，我看了觉得不行，完全不能用。这类学术的文字在国外都有一种规范，有一种 Style，你不了解这个情况，光语法上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就像一个外国人，他中文可以说得很流利，但你让他用中文写出来发表，一般说来就不行，道理是一样的。我们是要达到发表水平的，不是大概能传达出一个意思就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很幸运的是，有专门研究中国的很好的学者愿意承担葛兆光这部书的翻译工作，最后出版的译本就很好。所以你们现在办这份 *Chinese Arts and Letters*，主要采用母语是英文的人来翻译或撰稿就比较好，效果是不一样的。

杨昊成：是的。当初他们让我来主编这份刊物的时候，我就定下一个标准: 翻译一概用母语是英语的人，哪怕他们翻译过程中犯一些低级的错误也没关系，因为那是小问题。文学作品是最难译的，一些最微妙的东西最容易在翻译中丢失。可他们有的确实译得很精到，而那样的译法恰恰是我们中国译者怎么也译不出来的。比如现在十分流行的一些用语如“包二奶”、“人肉”等。还有一些老话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狗窝”，我们原来一直都以为就只有“East, west, home is

best."这样的说法，但他们有人就译成"Gold dish, silver dish, they can't compare to your own dog's dish."，居然将原文中"金"、"银"、"狗"这几个意象都保留了，还押韵，让人眼睛一亮。前些日子在餐桌上我说给陆谷孙先生听，他都眼睛一亮。中国文化"走出去"除了翻译之外，还有一个理想的模式，就是直接用英文撰写。这就自然让人想起辜鸿铭、林语堂这样的大家，当然还有您。像您这样站在高山之巅，却能用一种平实理性、纯正地道的语言来阐释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故弄玄虚，让人能够接受，我想这跟对语言的驾驭是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的。不论是直接用英文写还是翻译，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所以应该是 introduction and translation，也就是谢天振先生一直在呼号和强调的"译介"，而不仅仅是翻译。林语堂的翻译从传统的翻译标准来看应该说是有问题的，省略、阐释、结构调整等等，比如他译的 *The Wisdom of Confucius*，就是所谓的"creative treason"。但他的效果是好的。代表作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等，既写又译，在西方更是大受欢迎。与他相比，许多人的翻译要忠实得多，但是所达到的效果跟林语堂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张隆溪：你讲的这一点很有道理。其实我们还可以来看另外一个例子，那就是钱钟书先生写的《林纾的翻译》。林纾因为不懂外文，在翻译中闹了不少笑话，但钱先生宁可看林纾的翻译而不愿看别人的翻译，因为林译有很强的可读性。再比如傅雷的翻译。有人说傅雷的翻译不够忠实，但傅译读起来很上口，很舒服，同样有很强的可读性。我当年在北大跟杨周翰先生读硕士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博士，做的学位论文是莎士比亚悲剧。论文答辩时除本校的杨周翰、李赋宁先生外，还请了卞之琳、王佐良和中央戏剧学院的廖可兑先生。卞之琳先生翻译过《哈姆雷特》，当然朱生豪之前也译过。当时卞先生问了我一个问题。卞先生口音很重，英语说得很差，不过我还是听懂了。他也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后来的几个问题他都写在了一张纸条上。他问：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是译成"活还是不活"，还是"生存还是毁灭"，哪个译法更好？"活还是不活"是他的翻译，他问这个问题显然是希望我赞成他的翻译更好。但我直白地说了自己真实的想法：朱生豪的翻译流畅而且斩钉截铁，又很有那个味道；卞先生的翻译纯粹从文字上看显然更加忠实，因为"活还是不活"在形式上保留了原文对"be"的重复，但读起来没有"生存还是毁灭"那样有力量。

杨昊成：文学性好像也差一点。

张隆溪：一点不错。从忠实原文的角度讲，卞先生做得也许更好一点，但

朱生豪的译本更有可读性。所以我觉得信、达、雅三者之间并不是冲突的;be 是生存,not to be 就是死,不就是毁灭吗?"生存还是毁灭"无论从节奏、韵律还是文学性上讲都非常好,但又是忠实的。我就这么回答卞先生。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哪怕那时我是在接受考试。我也知道卞先生不会生我的气,因为这几位老先生对我都特别好,不会觉得我冒犯了他们。今天葛浩文演讲中也说到,他考虑的主要是"my readers",这是对的呀! 今天德国的 Kautz 和法国的 Rabut,他们两位的意见就不太一样。当时我没有机会发言,后来在一起吃饭时,我就跟 Rabut 说,你们两位的争论完全重复了 18、19 世纪以来德国和法国在翻译理论上的分歧。我们现在讲翻译史的时候,总会提到 Schleiermacher 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不同的翻译方法》。其实早在他之前,歌德在和艾克曼的谈话录里面就已经谈到了两国在翻译问题上的分歧。Schleiermacher 的比喻很有名:翻译方法,一种是把外国的作家请到本国来,一种是把本国的读者带到外国去,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讲的 domestication 和 foreignization。这讲得比较好。但 Schleiermacher 那篇文章唯一的不好就是那个结论,他说搞翻译的人必须两者取其一,这就把归化和异化对立起来了。我自己并没有做很多翻译实践,但我在文革中自学英语时,翻译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当时学英文用的是 Palgrave 编的那个 *Golden Treasury*,相当于中国的《唐诗三百首》。我当时翻译了 300 多首诗,这在我一生中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因为翻译文学作品,尤其是译诗,每一字都必须弄清楚,这对训练一个人的语言能力极其有帮助。后来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我曾经受朱光潜先生之托,翻译了朱先生的博士论文《悲剧心理学》,所以这方面我还是有一些经验。我现在与其他国家一些学者一起,撰写一部文学的世界史,我写中国文学史,其中也要涉及到翻译。德国人希望译出来的东西还有原作的那个外国味道,这跟德国这个国家的特点有关,因为德国在欧洲历史上长期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很长时间内它都是分裂的。另外,德国跟法国比,其文化、文学传统也比较短。法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了,法国人觉得他们是欧洲文化的中心,对自己的文化、文学乃至语言都有一种非常自傲的感觉,到现在也还是这样。所以,他们觉得把别的文学翻译成法文,当然要符合法文的习惯,不符合就是野蛮的,他们甚至觉得能来翻译你的东西就已经很瞧得起你了,而你能像法国人一样说话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他们的翻译基本用的是 domestication。德国人就不一样了,从 Schleiermacher 到黑格尔到当代都是这样。黑格尔在他的《美学》里讲

到戏剧的时候就说，德国人翻译外来戏剧要尽可能保留原作的风格和语言习惯，使人一看就知道那是从外国翻译过来的东西。但法国人翻译时却尽量把外国作品法国化。黑格尔用了一个词，nationatlisiert，完全把对方变成一个本民族的东西。其实我认为，两种方法都各有所长，而且并不互相排斥，比如傅雷的翻译。以前还有一位钱春绮，听说是个医生，翻译了好多德文的东西，包括海涅、席勒等人的诗歌，都翻得很好，而他们的翻译两种方法都用，所以归化和异化是不冲突的。

杨昊成：这其实跟钱钟书先生的"化境说"颇为相似，就是译作读起来不像翻译，就像自己的母语一样。这正好跟鲁迅先生的翻译主张相反，因为鲁迅是主张译作一定要保留原作的风味，就要有异国情调。

张隆溪：对。这跟鲁迅的思想有关，因为他觉得当时的国家太过腐败，必须要有异国的东西来冲击一下。他说中国就像一个大染缸，什么东西到了我们这里都染黑了，变味了，所以他主张硬译。鲁迅的主张有他思想的背景，但从翻译的角度来看，鲁迅硬译的主张是非常失败的。你看他那个《域外小说集》，如今谁看呢？没人看呐。

杨昊成：张先生，您是公认的比较文学大家，我想就这个问题跟您讨教一下。比较文学这些年来一直很热，但同时它又是个颇有争议的学科。比较文学当然有许多可以比较的方法或角度，如果我们结合这次上海会议讨论的主题，从影响比较这个角度来看，您以为一位作家在创作自己具体作品的时候，异域的文学或文化对他真的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比如莫言写他故乡山东高密地区的人和事，贾平凹写他陕西商洛地区的那些风土人情，还有那些纯中国特色的文学，比如上世纪80年代流行一时的以刘心武、史铁生、韩少功、张承志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知青文学"这些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学样式，也包括参加这次研讨会的王安忆等作家的一些作品，他们在创作那些作品的时候，心中是否会受着西方某种文学流派或某些作家的某种文学风格的影响？

张隆溪：我想大概不会。影响这个概念是比较早的。法国比较文学界在19世纪提出了一个比较的思想，那是受到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比较是要有根据的，不能随便把两个东西无缘无故牵强附会地放到一起进行比较。法国人叫做"事实的联系"，rapports de fait。比如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的作品，对他后来自己那些象征主义诗歌的写作确实产生了影响。实证主义之外，当时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影响，因为比较文学从一开始起就是超越民族主义文学的，不是一种语言一个传统，而是两个以上，但它的基础还是民族主义，就是以一个民族为基础进行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有了改变。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平

行研究的思想，不同的文化传统之间不一定非有什么影响，而是各自会有一些共同的主题及其表现手法，比如描写爱情、战争、死亡等，这是全人类都会涉及的问题，并不是哪一方影响了另一方。平行研究的背景是二次大战，因为这次战争从很大程度上说就是民族主义过分膨胀的结果，纳粹认为雅利安民族是优等的，而斯拉夫民族、犹太人等是劣等民族，应该诛杀。而许多优秀的比较文学家恰恰都是犹太人，对纳粹的思想特别痛恨，对民族主义很反感，他们许多都逃到美国去了，像最著名的 Erich Auerbach，他原来是德国马尔堡非常有名的教授，希特勒上台之后被赶走了，先到了土耳其，后来到了美国。他们认为 19 世纪那种影响研究、"事实的联系"等思想或方法，一定程度上说都是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因此引起他们的反感。平行研究的思想和方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这样的方法到现在为止依然很重要，就是所谓的主题研究，thematic studies。

杨昊成：这让我联想到自己这几年来所做的一项研究，就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研究。这个人可以说是美国反叛激进文化的一面旗手。尽管梅勒是一位职业作家，他的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和 *The Executioner's Song* 也分别于 1969 年和 1980 年获得过普利策奖，但我认为他的影响更多的还是文化史而不是文学的。梅勒总是以一种特立独行的姿态跟主流文化、传统价值唱反调，虽然往往也不乏故意为之以显示其 macho 的形象，但恰恰是他这种公共知识分子式的不合作态度，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美利坚民族的民主与自由以及独裁政治文化之不可能。所以梅勒让我联想到了鲁迅。鲁迅当然是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许多作品公认是一流的。但鲁迅之所以为鲁迅，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因为他有着巨大的文化史意义，他也是一面反叛激进文化的旗手。尽管鲁迅和梅勒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环境大不相同，文学风格也迥然有别，但从文化史的角度将两人进行对照研究，是否就可以算是一种平行研究?

张隆溪：当然可以。中国、美国之外，上世纪 60 年代欧洲等许多国家地区都爆发过文化革命，但性质不一样，背景也不一样。比如美国是反对越战，当时许多人烧征兵证，游行抗议，占领学校办公楼，另外嬉皮士文化、New Religion、吸毒、摇滚乐、性解放、黑人民权运动等等，都是那个年代产生的。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运动，和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这一点在 Daniel Aaron 的回忆录中有一段说得很清楚。我当年在哈佛时接触了 Daniel Aaron 教授，他在美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被誉为 Father of American Studies。他今年已经 102 岁了。当时我经

常在他办公室聊天，后来我到加州工作，他写信给我说，“I miss our conversations.”2010 年我应 David Damrosch 教授的邀请去哈佛作比较文学方面的 Renato Poggioli 讲座，抽空去见了他，他送了我刚出不久的一本书 *The Americanist*。我最近在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准备到德国去讲这本书的。书中后面有一处就提到了美国上世纪 60 年代的学生运动，讲得很有趣。Dan 一直是研究左派文学的，他最有名的一本书叫 *Writers on the Left*，写得非常好。

杨昊成：钱钟书先生也很欣赏这本书。说到 Dan，也真是巧了，那年在哈佛时我的导师 John Stuffer 教授对我说，如果做美国文明史，你最需要拜访的人是 Daniel Aaron，因为“Dan is history *per ce*”，20 世纪美国文化界几乎所有的名人他都接触过，教过肯尼迪，还是海明威的朋友。我很幸运几次到他办公室和他聊天，后来还到他家里去，因为我房东家跟他的住处只有 5 分钟路程，都在哈佛园边上。有一次聊天中他告诉我，1980、1981 年他曾先后 2 次到访中国，接触过钱钟书夫妇、杨宪益夫妇、冯至、梅绍武等人。两次访问的内容他都记了日记。说着，老先生站起来从他的保险柜里将那两年的日记翻了出来给我看。我粗粗一看，觉得很有价值，就斗胆问他是否可以让我复印带回国内编译发表。他居然同意了，让我喜出望外！但后来我仔细看过之后发现，其中涉及到社科院某些人比较私密的问题，还有他对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的看法，因此就一直没有处理。钱先生欣赏 Dan 那本书的话我就是在他的日记中看到的。他还提到了您，说您是“one of Qian′s star pupils”。什么时候我可以把他的日记传给您。

张隆溪：好。Dan 后来还出了 *American Notes* 等著作。他现在好像还在写一本书。

杨昊成：一百多岁的老人了，还在不断出书，真让人敬佩！他身体也好。92 岁之前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在哈佛园附近绕一圈后到学校，然后扛着车上他在二楼的办公室。可是有一次连人带车从楼梯上摔了下来，从此只能靠 walker 行走了。

张隆溪：后来他也给我写信，其中说到，“It′s not a good sign that I find girls walk faster than I.”

杨昊成：再回到文学的话题上来。《中华人文》第 1 期发了苏童的 2 个短篇和《中华读书报》记者对他的一次采访，我个人更喜欢那个采访。结尾处记者也提到“走出去”的问题。我觉得苏童的回答非常理性，他说，“中国作家不存在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这让我想到“世界文学”的话题。时过境迁，世界文学的概念和含义恐怕和当年歌德最早

提出这一术语时已经大不相同了,如今学界对它的阐释也是各种各样,但在我看来,"世界文学"似乎是一个伪命题。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的"世界文学"吗?什么叫"World Literature"?除非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作家都用同一种语言写作,其创作勉强可称之为"世界文学",否则,"世界文学"一定是由一个个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语言、风格书写的反映各自社会和人生的文学所组成。也就是说,"世界文学"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空的,好比"书",我们能拿出一个叫做"书"的东西来吗?它一定必须具体化为某一部书才是真实的、可触摸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学和其他任何国家或民族的文学一样,天生就是"世界文学"的一份子,不存在"走出去"的问题,不走出去它也还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苏童的讲法很有意思,他说,作家就像一个棋盘上的棋子,中国作家是其中的一颗棋子,美国作家是另一颗棋子,英国作家又是一颗棋子,无论你把这颗棋子挪到什么地方,它始终还是在这个棋盘上。这个棋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世界。这么看来,眼下这"走出去"、"走向世界"等口号,说白了,就是要让中国文学走进西方或其他强势文化,似乎只有为西方强势文化所接受了,中国文学才算真正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份子。我想这是不是跟莫言的获奖有着直接的关系?许多人也许不肯承认,但潜意识里还是存在着某种对西方主流或强势文化的心理期待和情感依赖。莫言虽然早已是一位具有真正实力的作家,但获诺奖之前,其名声和地位却远不是如今之火爆和如日中天所能相比的。我想,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一事件一定给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有关各方产生了不小的触动。

张隆溪:我想也是这样。说到"世界文学",Pascale Casanova 有本书叫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我对它有很多批评,因为作者是个欧洲中心主义者,尤其是个法国中心主义者。但她的这一观点我是同意的,就是,这不是一个平等的世界,其中有中心有边缘。Casanova 的头脑很清醒,不像有些人那样随意表达一种乌托邦式的思想,因为这个世界确实是不平等的。所以,无论是官方还是作家乃至民间,"走出去"的口号的背景,我想就是这么一个世界不平等的事实。虽然中国有很悠久也很优秀的文化传统,但近几百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劣势,直到最近30 多年来,经济上很成功,才开始发展起来,也才想到要"走出去",以前可能连这个希望都没有。什么是"世界文学"?并不是什么文学都可以叫"世界文学",这是没有意义的。在我看来,第一,它是超越某一民族或地域的局限的。体现"世界文学",一般说来,亚洲、美洲、欧

洲、非洲等基本都必须要提到，而不能只局限于某个很狭隘的地域。第二，不在于数量的多。Franco Moretti 提出过一个“distant reading”的概念，就是说研究“世界文学”并不是简单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学作品拼凑起来，而是依靠各国学者对具体文学作品的评论，对“世界文学”上有影响的文类和类型等观念，有大致的了解。“世界文学”就是把每个文学传统中最好的东西介绍到一个更广泛的世界的范围内，让其他读者都能来欣赏，而这样的作品应该是经典的。我对“世界文学”有很大的热情，一方面是它现在已逐渐回归了文学本身。在美国和欧洲，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到 90 年代盛行的文学理论后来逐渐离开了文学本身，变得抽象、虚玄，现在“世界文学”要回归文学本身。还有一个好的方面，就是歌德当年提出“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是受了中国文学的直接影响，这就打破了欧洲中心主义。这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令人鼓舞，因为歌德当年是看了中国的小说如《好逑传》等之后提出这一概念来的。

杨昊成： 2013 年 5 月份我曾请杨慧林先生到我们学校讲学，他主要讲了理雅各的《论语》翻译。后来我在送他去机场的路上跟他谈到“走出去”的问题。那时我正在看民国时期最著名的两大英文刊物 *The China Critic* 和《天下》月刊。那些作者、编者或译者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有着留学西方名校的背景，在那样一个乱世，有良知有担当，很希望把中国的好东西介绍出去。这些人包括张歆海、刘大钧、桂中枢、潘光旦、宋以忠、马寅初、陈钦仁、钱钟书、胡适、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全增嘏、姚莘农等，可他们其实大都并不是从事文学或语言专业的，什么背景都有，但无论其语言还是学养，做这件事都绰绰有余。看到他们写的东西之后，我有一种深深的自卑。杨慧林先生听了我的话之后十分赞同，他说，与其花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办孔子学院之类“走出去”的事，还不如扎扎实实来总结前人做的那些工作，他把这叫做“汇释汇校”，将这些刊物上发的文章整理、归类、校订、加注、阐释，一本一本地出，其中可以有很大的学术含量。昨天我在陆谷孙先生那里也跟他谈到这个问题。我跟他说，我在来上海之前又把张隆溪先生那篇谈钱钟书先生的《七缀集》的英文论文看了一遍。钱先生在谈 oyster（“牡蛎”）这么一种软体动物的时候，居然能够在中西文中找到那么多例子来佐证，简直匪夷所思。就是您这篇文章本身也全是扎扎实实的干货，其中有着巨大的信息和学术含量。陆先生自己近年来一直在编《汉英大词典》，我看了他发给我的一些词条，实在觉得惊诧，问他，您那些词汇是从哪里来的？他的回答很简单“读书啊！”可是像他这样

的大家居然还跟我说，看了民国时期那些东西，觉得自己“是先贤的不肖子孙”！说起来不免有几分虚无主义的味道，但我个人常常觉得，我们这一辈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当然从积极的方面讲，这倒也可以成为我们年轻一辈努力的动力，所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张隆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文化生态不如那个时代。不要相信历史总是直线型向前发展的，也不像黑格尔讲的那样是螺旋形往上发展的，不一定的，欧洲的中世纪就比古代差很多，所以后来有了文艺复兴。中国的情况讲起来比较复杂，以前列强要瓜分中国，可是没有完全瓜分，中国也太大，瓜分不了，列强之间就存在许多矛盾和利益冲突；日本占领东三省，德国就不同意，因为青岛有德国的利益。这是中国之幸，中国终于没有亡国。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那样的乱世却正好给了文化发展以一定的空间。比如上海当时就有许多租界，鲁迅遭通缉，他就可以跑到租界去避难，这个租界不行就去另一个租界，这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事情。在大一统的时代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这是大的环境。从小环境来看，现在旧学功底好、外语好、又有国外留学背景的人很少。刚才我们讲比较文学、世界文学，说实话，做这个是很难的事情，因为两个方面都要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当时像钱钟书这样的人当然可以做，但钱先生并不是唯一的。我们现在做比较文学的人太多了，但可能很多人其实并不具备这方面的条件。我本人是比较喜欢古典的东西，我认为能读懂古文欣赏古文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语言。就说英文吧，我们不讲更多的语言要求，仅仅读懂英文是不够的，那还只是一般的皮毛。在中国，绝大部分比较文学学科设置在中文系，而中文系连这个皮毛都存在问题，许多人只能通过翻译作品来了解国外的东西。还有一个交流的问题。国内的许多学者对国际上的学术动态并不了解，没有接触，无法跟人沟通，不清楚别人在写什么，怎么写，拿不出符合国际学术规范、够水准、能在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的东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界不像现在这样跟外界那么隔绝，中国一些优秀学者发表的东西国外也很关注。现在中国也有很杰出的学者，有丰富的研究，但和老一代学者们相比，在掌握外文方面就不如你提到的当年那些前辈。我现在之所以给 Brill 编那套丛书，就是因为我希望让国外知道，中国学者中也有写得很好的东西，汉学家们不能再轻视或忽略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但国内最好的学者基本上都不是做比较的，比如上海的（下转第 114 页）

[22] 周作人. 辑译. 点滴 [M]. 北京: 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 1920.
[23] 钟叔河,编订. 周作人散文全集 2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4] 鲁迅.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 [M] //鲁迅全集(第四卷).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5] 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26] 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J]. 新青年,4,1918,(4).
[27] [英] 苏文瑜, 周作人. 中国现代性的另类选择 [M]. 康凌,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28] Bhabha, Homi. *Location of Culture*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29] Robinson, Douglas. *Translation and Empir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7.
[30] 钟叔河,编订. 周作人散文全集 4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1] 钟叔河,编订. 周作人散文全集 3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2] 周作人,鲁迅,译. 现代日本小说集 [M].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6.
[33] [法] 巴柔, 亨利. 形象 [M] //孟华, 译. 比较文学形象学. 孟华,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34] 钟叔河,编订. 周作人散文全集 6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5] 刘禾. 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 [M]. 宋伟杰,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2002.
[36] 周作人,译. 陀螺 [M]. 北京: 北京新潮社,1925.
[37] [美] 李欧梵. "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 [C] // 李欧梵.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季进, 编.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上接第 200 页)

葛兆光、朱维铮、王元化先生等,基本都还是做研究中国传统的学问。他们几位应该有阅读外文的能力,我知道王先生就翻译过英文的文章,葛兆光在研究中往往直接引用日本学者的著作,但他们直接用英文撰写恐怕有问题,所以他们的研究成果必须要人翻译。最近 Brill 的丛书里就要把朱维铮的《走出中世纪》重新译成英文出版。因此,搞比较最基本的一个前提就是语言,甚至要多种语言。

杨昊成: 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搞外国文学、比较文学、翻译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等研究或实践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我们这一辈跟前辈之间存在的最大的差距。

张隆溪: 是啊,民国时代那样的学人现在再也找不到了!

杨昊成: 夜已经深了,尽管我还有许多问题想向您请教,但不忍心再打搅。衷心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

张隆溪: 不客气。这两天有时间咱们再接着聊。